

花山文藝出版社

程云瑞 著

文化 經營 管理 論

WENHUAJINGYINGGUANLILUN



作者像

文化市场流通与著作权保护开发

流通是文化市场理论和实践的一项重要内涵。一方面，它把文化生产部门组织生产的文化产品多层次地供给消费者，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把文化消费市场的需要反馈给生产部门，保证文化生产的重新开始和促进生产的不断壮大。流通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是一种宏观管理。当然，我们对其进行宏观管理，按

作者手迹

目 录

序	高占祥(1)
文化领导	
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宏观把握	(3)
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观	(16)
文艺领导的非权力性影响	(22)
文化投资的补偿优化	(36)
经营理论	
文化经营的体制基础	(39)
文化艺术商品拜物教的源与流	(43)
商品意识下的文化经营道德	(47)
文化经营体制的模式转换	(51)
文化经营短期行为的功能调控	(55)
群众文化	
量化评比在“两馆一站”管理中的科学运用	(59)
群艺(文化)馆实施承包责任制应关注的几个环节	(65)
确立文化馆(站)经营观的理论基础	(71)
群众文化机制中精神文明的法律意识	(76)
价值工程与群众文化经营	(83)
群众文化经营决策	(87)
群众文化经营预测的方法	(98)

表演艺术

- 当代中国表演艺术的流变与律动 (106)
唐剧的历史沿革与走势分析 (114)

企业文化

- 企业文化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123)
企业文化的一般特征 (127)
企业领导的文化开发 (135)
企业文化运行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 (140)

图书

- 解决图书经费拮据的社会化途径 (154)
导读需要全社会的共识 (158)

文博旅游

- 文物旅游综合开发的市场意蕴 (161)

文化市场

-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市场理论 (163)
文化市场管理的内在机制 (170)
群文市场中的消费需求模式 (174)
文化市场流通可否作为产业开发 (179)

行业文化

- 沿海文化的特点及其矛盾运动 (183)
节日文化与社会稳定 (189)
庙会文化品位论 (198)
当代城市的朝阳文化 (207)
村落文化与村落经济发展的道路及其模式取向 (215)

新颖·深广·缜密

- 青年学者程云瑞文化理论文章侧评 李民雄(224)
后记 (226)

序

● 高占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各行各业都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文化艺术实践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需理论界给予阐释、回答，以指导文化艺术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个任务异常艰巨、复杂，从事其研究工作尤其需要矢志不移的崇高的奉献精神。

值此，我在这里向读者着重推荐既是学者又是普通文化艺术行政管理干部程云瑞，耗费几年的心血，所结集的这本论著。

我与云瑞同志相识，是在几次全国性理论研讨会上。首次是在延吉召开的“全国艺术管理学研讨会”，他专门发表了艺术经营的见解。第二次是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节日文化研讨会”，巧得很，正是我为他颁发了宣读论文证书。我历来特别关注从基层来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因为他们每天要处理很多事务性工作，几乎没有专门坐下来研究理论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写出几十万字的文章，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对云瑞同志发表的论文就看得更仔细。我感觉，收入这本集子的34篇文章，基本上反映出他的艺术追求及质量水平，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涉猎范围广泛，理论色彩浓厚。这本集子的选题从文化领导开始，继而对群众文化、表演艺术、图书、文化市场、企业文化、文博旅游、节日文化、庙会文化、村落文化、社区文化，尤其是对目前热点的文化经营理论进行逐一论述，透过现象，入木三分，使论文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

其次，立意构思新颖，带有明显的超前意识。立意新颖是论文的生命。选题构思的新，来自文化艺术实践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关键是能够敏锐地发现这些新问题，并且给予科学地回答。正是在这点上，从论文中明显地看出作者深厚的功底。收入专著中的论文最早形成于1985年，时过8年，我们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视角来审度，仍就对文化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经营理论，不仅在5年前发表时使人耳目一新，今天读来，仍令人产生新奇之感。

紧密结合文化艺术工作实践，通过理论的校正和框定，使文化经营管理实践逐步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这是该书体现出的又一特点。我们研究文化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对文化经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义上。作者深谙其中的真谛，力求使理论不说教化、概念化，而是紧紧贴近现实。使理论具有了实际操作性、可行性，从而对文化艺术工作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当然，有些问题还处在研究探索阶段，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深化。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文化经营管理实践起到推动作用，产生积极影响。

文化经营管理工作，从高层次上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设计、筹划以致施工、装饰，我们文化事业的金字塔才会更加雄伟、绚烂。希望有更多更好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经营管理理论著早日问世。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日

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宏观把握

社会主义国家的每一名文化艺术工作者，肩上都承担着用共产主义思想启迪群众、教育群众、激励人民同心同德干四化，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的重任。要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职责，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有准确地把握。

一、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石

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反映论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是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和理论建设反复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含义。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是在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首先他们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恩全集》第23卷第24页）在这里，马克思坚持了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文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其次他们又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机械论，强调了认识的辩证法。确认了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的能动的反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这样两方面问题，列宁指出：“物、世界、环境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映象；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而存在的”。（《列宁全集》第14卷第61页）另一方面，列宁又说过：“智慧（人的）对待个别事物，对个别事物的摹写（=概念）不是简单的、

直接的，照镜子那样死板的动作，而是复杂的、二重化的、曲折的有可能使幻想脱离生活的活力”。（《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页）综上可看出，一方面，必须肯定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艺术对生活的反映不是简单的、机械的、纯客观的，是一个极富个性、创造性地过程。正如列宁所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因此，既要反对唯心主义的割裂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自我表现”说，又要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文艺工作者主观精神的机械反映论。这些基本原理，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建立的理论基石。

第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是社会主义现代文艺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五·四”运动前后，多种社会思潮和学说纷纷在中国兴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崭新的思想内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宣传和介绍马列主义到中国。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文化思想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揭示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五·四”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并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在革命斗争烈火的冶炼下，其它种种学说、思潮、主义相继烟消云散，成为历史的陈迹。所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第一次与中国文艺的结合所产生的划时代意义，是其他任何学说、主义对中国文艺运动产生的这样和那样的影响所无与伦比的。在历史的筛选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为传遍全球、震撼世界的最有影响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所产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文艺科学成为世界东方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天下昭昭，有目共睹。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的文艺思想，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才是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什么时候亵渎甚至背离了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会失去勃勃生机，甚而走向歧途。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基石作用具有永恒意

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新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的要求。它不仅对新时期的文艺思想具有科学的奠基意义，更对新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具有永久的指导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对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并不是靠国家机器维护的，而在于它本身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严格的科学性与彻底的革命性的高度统一的理论体系，是人类思想史上唯一的独具这种优点和特点的理论体系。它完全是靠自身所具有的真理的力量，去指导社会主义文艺走向胜利。就像真金一样，经过歪曲、诋毁的冶炼，越加放射夺目的光彩。

二、关于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文艺的方向问题，一直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认识模糊，以至发生怀疑，就会使文化艺术事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甚至南辕北辙，铸成大错。

第一，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成因。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40多年来，一直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指导方向。这一方向的确定，国际背景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和革命导师列宁所提出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文化理论。就国内背景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所决定的。它始终坚持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化艺术只是遵循自己特殊规律用形象思维的形式来为以工农兵为代表的人民大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工农兵群众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国防建设的第一线，是我们国家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也是文艺的开拓者，文艺工作者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他们，这是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从历史上看，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谋求解放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理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文化艺术，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要求文艺工作者不仅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歌手，更应成为反对剥削制度和黑暗势力的战士，是战鼓、是号角。从民族文化素质来看，工农兵大众文化水准还不高，时至今日我国还有2亿文盲，提高大众的欣赏水平，首先要适应，在适应中提高，搞非理性，人民群众很难接受，这种历史现象将会在长时期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重要的成因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为确定文艺统一方向提供了基础，

这是与资本主义文艺最本质的区别之一。在我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是共和国的最主要力量，为他们服务理所当然。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这又为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贯彻提供了保证。

我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随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更加清晰，从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发展丰富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是《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这个方向，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坚持，就是现在以至将来也都要坚持。

第二，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所涵盖的历史与现实内容。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有丰富的内涵，这里择要论次：

1.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6页）这段话至少说明：（第一）文艺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因此它的性质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和制约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为文艺发展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一定时代的文艺的内容和性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文艺发展的根本动力。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文艺，这已被人类文艺史的大量事实所左证。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产生资本主义文艺，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则必然规定出社会主义文艺质的规定性。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文艺，只能是逆历史而动，在中国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文艺的经济基础。（第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基础发挥作用是通过政治作为中介环节而实现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文艺可以不属于政治，也可以不服从于政治，但是，文艺不可以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不可以没有政治责任感。有人无视文艺与政治的这一规律，主张“淡化政治、远离政治，把文艺从政治腰带上解下来”，只不过是一种欺骗手法，实际上，他们要使文艺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然后纳入资产阶级政治，让文艺为他们的“资本主义”服务。

还有人将文艺与政治的这种关系称为“一种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这种立论，并不懂得世界和中国文艺发展史中所表现出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真谛。如果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所给予欧洲的革命的巨大推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划时代变革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国民党文人陈纪滢在《抗日文艺琐记》的一段话也许能够略见端倪：“话

剧的功能，实在也超越了教室的课本与堂堂文告。话剧既是抗战时期宣传的尖兵，也是主力。我们把日本打败，话剧的功实不可没！然而大陆的沦陷，也是话剧之过，因为我们的国力多半投注于与中共的武力斗争中，忽视了后方各大城市，尤其是平、津、沪的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共利用它的爪牙及其同路人演些解除人民思想武装的话剧与电影……两三年内，就把军民的思想堡垒完全击溃了。”（《近代中国》第49期）这段话虽然反动，但从反面道出了革命功利主义的存在和威力。退一步讲，那些表现为无倾向性的艺术门类，虽然本身并无功利的考虑，但是他们作品的风格和情趣都主要“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的确，有一种精神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由于这个作用，他们才看到某些时代某些国家的艺术宗派，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忽而发展写实的精神，有时以素描为主，有时以彩色为主。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的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们改弦易辙”（丹纳《艺术哲学》第32—35页）。

以上不同视角的论述，可以看出，革命的功利主义与狭隘的功利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文艺是不能脱离开政治的。当然这种不脱离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艺仅仅是为某一时期的政策和任务服务，把文艺当作政治的纯粹实用工具，作为政治口号的图解。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不意味着要求文艺只消极地反映，摹仿、复制、追随政治，而是在反映中要有超越，在纪录中要有升华和创造。给人以愉悦享受的同时，给人以建设、改造社会的力量。人们的精神世界是无比丰富的，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那种“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单调的清一色的局面，只能令人窒息，在文化生活中，决不能搞僵死的公式主义。

2. 文艺的阶级界定性。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坚持。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如何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阶级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它既不是“泛阶级论”，也不是“泛人性论”，而是具有严格界定的阶级性。这种辩证的观点防止了两个极端的产生。

（第一）防止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无限扩大化。在文艺史中，文艺的诸种内容与形式，诸种题材与体裁，曾被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文艺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众所周知，这种错误已经造成了我们党的灾难、国家的灾难和文艺工作者的灾难。无庸置疑，在文艺界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作法，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的。

(第二)防止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人道主义”或“泛人性论”无限扩张。人道主义应该成为进步文艺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爱是有前提的,无产阶级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是有阶级界定的。因为超越时间与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泛人性论”、“泛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不相信那些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谎言。我们相信,只有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感染人民,我们的文化艺术才能保证它的社会主义方向。

应该指出,当我国将剥削阶级消灭,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以后,一些人丧失了应有的警觉。他们忘记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在一定范围内,两个阶级的斗争并未偃旗息鼓,他们更忘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有激化的可能。因此,面对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企图用和平演变的形式对我腐蚀、渗透的严酷现实,充耳不闻、高唱起“趋同论”的凯歌,做了资产阶级的传声筒。这从反面提醒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属性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一方面要坚定不移,一方面要严格限制在一定界域,因为文艺现象毕竟是气象万千和无限多样的。

3. 文艺的党性原则。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提高民族精神素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如果能用自己的作品和理论使人民振奋起来、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去投入新的伟大斗争,那正是他的职责的光荣。为了实现这一神圣使命,就必须坚持文艺工作的党性原则,因为这是文艺事业走向胜利的保证。

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必须要解决立场问题。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40年前,毛泽东同志曾谈到,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甚至有的常常失掉自己正确的立场。40年后,从总体上说,不能说立场问题仍未解决,关键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些同志还有些模糊。似乎在“世界充满爱”的大同天下里,根本无需谈及立场。从而该痛加暴露的反而给予同情和歌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的火热生活应该歌颂反映的,却不屑一顾,疏远淡忘了人民,而沉湎于“自我深层意识”的开掘,一切从主观出发,从个人出发,这不能不说立场的错位。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题材的倾向来论断作品的价值,也不可因为题材问题就不加分析地上升到立场问题,并不是说个人的情绪就不能表达,那将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是,文艺是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以及人民在生活进程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化心理的一种真实而自觉的反映的表现,因而也可以

说文艺是帮助人民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完善生活和完善自己的一种生动形式。它的价值首先在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和文化素质。“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立场，做为重点应以强调。除此，一些娱乐性的文艺产品，能够对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发生调节与润滑作用，使其在紧张的生产与劳动之余通过对文艺鉴赏活动，使疲劳的身体和紧张的精神得到快慰和积极的休息，从而迅速地恢复在生产劳动中消耗掉的体力与脑力，以便重新以更充沛的精力去投入新的工作。对此也应兼顾，这是坚持文艺的党性原则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指向的文化需求，文艺才能沿着自身规律，得到健康发展和兴旺繁荣。

三、从“两个标准”到“两个效益”

用什么作为文艺的评价标准，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40年来，文艺思想的标准问题也在不断丰富、发展，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过程。从《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逐渐发展成社会效益是衡量文化精神产品的最高准则，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达到二者的统一。从而使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进一步系统化。

第一，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实质。建国以来，文艺批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前三十年与后十年两个阶段。在前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坚持了“两个标准”。毫无疑问，“两个标准”的坚持，对繁荣文艺、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当然，在一段时期中，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被推向政治化，割裂了“两个标准”的统一关系，把一些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作了政治化的处理，政治标准从“第一”走向“唯一”。“左”的影响从根本上玷污了“两个标准”的实质，限制了文艺工作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正本清源，深刻领会“两个标准”的实质，则是十分必要。

“两个标准”的实质是社会效益。“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

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按照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毛泽东论文艺》第42—43页）这段论述可以说明：

1. 文化艺术的社会效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按照文艺的社会效果评价文化产品的优劣，关键不在评论的人是文艺家还是政治家，而在于社会实践怎样，客观标准不是随意改变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政治家是第一流的文艺批评家，从事艺术批评者则至多只能是第二流的批评家，甚而由于他们的丢主捡次，根本上就不够批评家的资格”的逻辑顺序。2. 社会效果为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提供了依据。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一方面要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或“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忽视任何一方都是难以奏效的。3. 以社会效果看待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其涵盖应该是宽泛的，而不应是狭窄的。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则是好的，都应该受到保护。

第二，“两个效益”的标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对“两个标准”的丰富和发展。文化精神产品应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其基本的依据是文艺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生活在文艺工作者头脑中的观念形态反映。因此，只有关心和描写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以此作为主要题材，并将这些高度艺术化，才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这种理论，正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水乳交融后的广泛化。很显然，它应该做为第一标准加以强调。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改变，我国开始走向市场经济。从此，一部分文化产品也有了一些变化，在确定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文艺产品从出版、发行、销售、流通到观赏演出，也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文艺的生产性与创造性、流通性与观赏性日趋统一，使创作与鉴赏越加难以脱离生产和流通而独立进行。它的物化形态和公开卖票演出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特殊商品形式，这样就产生了经济效益。可见，在我国，文艺产品的生产，一种是不以商品形式流通，不惜代价无偿地提供给人民群众，这主要是国家拨给文化经费，不要求有经济效益，只要求有社会效益。但也必须注重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核算，要用尽量少的经济力量求得尽可能高的社会效益。另一种则是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这些单位用以维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社会，很自然，它们就应当注重经济效益。但是，它们的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因为文化产品毕竟是

一种特殊商品。它作为观念意识的表现，具有真与善的问题，要讲究真理性与思想性，一切反科学、愚昧落后、专制腐朽的东西，都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占据精神产品的主导地位而危害社会，玷污人的灵魂。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正是为了更好地取得社会效益。强调社会效益是最高准则，恰恰就是针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而言的。在确定了社会效益的大前提下，还必须认真对待经济效益问题，力求使二者达到统一。

第三，社会效益的灵魂及其两大主要内容。文化是人造的第二自然，它被人创造，同时也使人被其塑造。本质上意义上的人，实际上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人。社会中的任何成员都无法超越文化的浸泡，从呱呱坠地到撒手人寰，人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文化熏陶。内容健康、催人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能起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而一些低级下流的产品，则对群众有极大的毒害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效益的内涵极为丰富；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有利于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思想与道德的成长，有利于四化建设的文艺产品内容，都应是社会效益涵盖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凝聚成一个焦点，这就是社会效益的灵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说，一切文化艺术产品，一切文艺活动与实践，都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文艺事业发展与文艺的自身规律、使整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与文艺工作者高度的自由创造精神统一起来。

社会效益作为检验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标准，至少包括这样两方面内容：

1. 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曾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不论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求，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者都肩负着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责任。这个责任可以归结在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这是我国实现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所决定的。为实现这一任务，文艺事业必须有益于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公民的培养，必须有益于人民的科学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必须有益于推进社会观念的更新、促进有利于四化建设和社会改革的舆论环境、文化环境的建立，必须有益于整个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二是提供智力支持。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建设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化大业所提出的要求。文化艺术要为开发劳动者的智力资源、提高智能和素质、促进劳动者的个性的全面发展承担自己的责任。在遵守文艺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大文化”的优势，融宣、教、科、体、卫、文于一体，进行时政宣

传、科技普及、业余教育、文体活动，从而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2. 具备审美价值与娱乐功能。人们需要娱乐和审美，这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最基本的方式。人们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是要从中得到愉快的享受，以消除疲劳、调剂精神。这是文艺产品之所以存在的又一基础。娱乐和审美功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过去在人们生活中审美和娱乐地位低下，是由政治的动乱和经济的困乏这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必将使人民群众健康多样的审美娱乐需求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文艺工作者倘若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审美的享受和愉悦的休息，便背离了自己的“母亲”，社会效益的实现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社会效益标准的内容还有其它，恕不赘。

四、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途径描述

社会主义文艺思想不仅在于指明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评价标准，还在于指明达到这一正确方向的途径。

第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文化艺术迫切需要迅速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三十多年后，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呢？

1.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繁荣的重要途径。作为自由和民主在文化艺术上的某种表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我国的实现具有坚实的基础。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正是这种民主与法制，才能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得以实现，才能够在艺术上以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不同的学派自由争论、不同的文艺见解，开诚布公地、坦率地提出来，通过争论、辨析，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就可以避免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对于文艺中的是非问题，就可以通过文艺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充分说理用百家争鸣的方法去解决。30多年的实践证明，“双百”方针对促进文艺发展和繁荣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依旧是我们以后繁荣文艺的正确方针。

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需要方向的保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毛泽东论文艺》第191页）。因此，就需要有方向的保证。这个方向就是“二为”方向。在方向确定的前提下，选择那种